李浈 编著

幸余生

——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

秦大我题

中山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幸余生

—— 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

不同的人生可看做各异的河流轨迹。时局所趋，让河流汇集。他们交汇，或许度过一段艰辛的岁月，悠长的时日，相互扶持。然后再次追寻自己的轨迹，走向迥异的人生。

国难之时，饿殍载道。沦为难童的经历，让这些处于不同生活中的孩子，被收容入避风港中。然后，又再扬帆远航。脑海中，镌刻的记忆无法磨灭，细细回顾，丝丝珍藏着。

—— 董晓依博士，前美国纽约市教育资讯总监；
曾受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邀请在北京、上海、广州作企业管理讲座。

ISBN 978-7-306-03285-0
9 787306 032850 >
定价：48.00元

李浈 编著

幸余生

——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余生：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李浈编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4

ISBN 978-7-306-03285-0

Ⅰ.幸…　Ⅱ.李…　Ⅲ.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9875 号

出 版 人：叶侨健
封面题字：秦大我
策划编辑：王　睿
责任编辑：王　睿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陈　霞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84111996，84113349
　　发行部 020-84111998，84111981，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佛山市南海印刷厂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29.75 印张　483 千字
版次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500 册　　定　　价：48.00 元

本书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一

历史的真实

原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　朱家恺

承蒙李演教授的厚爱，要我为《幸余生》写一篇序言，我自知知识面窄，能力有限，只能请李教授赐我一份草稿，先学习受教育以后再说。的确，拜读以后，觉得非常振奋，一口气手不释卷地把全书看完，看完一次再看第二次，感慨万分，受教育颇深。过去的一些思想面目为之一新，我认为我们要重新评价这段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是对国民党的抗日将领在抗日救亡工作上的评价，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一直认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正值“东三省”沦陷的1932年，大敌当前，国民党当局却筹划大举进攻革命根据地，一而再，再而三，到第五次围剿虽成功，却引出轰动世界的万里长征。1936年“西安事变”后才改变态度要抗日，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还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包括一次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最后迁都重庆。而共产党抗日态度非常鲜明，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大大小小作战9.2万次以上，俘敌伪军110万人，建立15个抗日根据地。看完《幸余生》后方知国民党内也有抗日名将如李汉魂将军，在广东韶关、汕头等地南征北战，建立了赫赫的战功；同时在韶关支持其夫人吴菊芳建立了儿童教养院、妇女生产工作团、力行中学等，让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难童及难妇不仅有栖身之地，还有食有住，能生产自救，生活军事化，而且有组织有纪律、听指挥能吃苦、精神饱满、身强力壮、亦文亦武、能歌善舞，给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我们在衡量抗日的功过时，要区分国民党当局领导与所属的抗日名将有不同的看法，不能一棍子打死。

其次，作品里还记录了许多在儿童教养院、妇女生产工作团、力行中学等培训过的难童、难妇的成长历程。特别是部分同志在“十年动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因为历史上形形色色的问题，蒙受了不正常的待遇，受关管、批斗、劳动改造，这主要是当时推行“左”倾思想发展到极端的产物。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社会上大破“四旧”，可以大胆怀疑、不经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就下定论，使本来很好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了，再加上社会上又分成两大派别，相互指责，从“文斗”发展到“武斗”，其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固然首当其冲，旧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港澳台的家属、为英美有关单位服务过的留用人员、民族资本家、“臭老九”等都有被冲击的可能。我是从头到尾经历了这场“十年动乱”，我全家都是受害者，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故我对书中里所列举的事实，深表同情，完全可以理解。所幸的是在拨乱反正中，历史终究还了我们的清白，让我们还能重上征途，补偿十多年的损失，这已是万幸了。

最后，曾经参加过妇女生产工作团的陈竹老大姐在其文章中写得非常好，谨录一小段来结束我的序言：“在人生路上，‘左倾’顽石也给我们吃过一点点苦头，但和先烈、前辈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就当做是慈母偶然一次轻轻给我打一巴掌吧！我从未因此影响工作情绪，也不怨恨当时的处事者。我不但自己想得开，而且还会关心有关类似情况的同志，互相鼓励，共同向前看，我们的共识是：一个革命者，不论环境逆顺，都要喜国家之喜，忧国人之忧。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同心同德，同甘共苦，不变初衷，一颗红心共建和谐的大家庭。”

2008 年 11 月于中山大学

序二

历史的感性记忆和生命经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教授　邓启耀

拥有这样父母的人是值得自豪的：父亲是“不喜欢战争，亦反对不义的战争，却绝不害怕战争”（李汉魂，见第一章）的抗战名将，母亲是收养了3万战争难童的“院长妈妈”。李浈就拥有这样的父母。继《花开梦怀》[①] 之后，李浈教授又整理出版了这本回忆录。前一本为父亲李汉魂将军而作，这一本当为抗日战争时领导广东省儿童教养院的母亲吴菊芳而作。但这两个名字不仅仅属于李浈。无论是经历过还是没有经历过20世纪的那些苦难，人们都不应该忘记这两个名字，因为这两个名字代表着义勇和博爱。

《幸余生——抗日时期难童人生纪实》的主要内容由抗日战争难童和他们的“院长妈妈”及救援人员叙述起。然而，当我读完这些由他们的“个人笔记”和访谈录音综合整理的回忆录，发现这并不仅仅是关于抗日战争时期难童的故事，而是关于中国20世纪约70年历史的记忆。

他们叙述的历史大多开始于1938年。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数以万计的中国儿童沦为孤儿。和以政治事件、统计数字及理性分析为中心的史书或学者叙述不同的是，作为一种个人记忆，难童们的叙述是感性的、直接来自身体和心灵的经历。留在他们视觉记忆中的是“日本仔泼汽油放火烧屋”、“端着上刺刀的枪要你男的女的脱光衣服在他面前通过”、“随意抓过路人来做靶子练柔术把人摔得死去活来”、父母或亲人“被鬼子抓去开膛暴尸野外”（难童文干，见第二章）；留在他们听觉记忆中的是警报器凄厉的尖啸、飞机刺耳的俯冲声和炸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四面枪炮之声大作，是时婴孩嚎哭，妇女悲鸣……眼看大好家乡瞬成地狱”（难童

① 李浈：《花开梦怀》，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关铨和，见第二章）；他们难忘身上长满虱子头上长满疮的日子，难忘因极度惊惧而尿湿了裤子的感受，难忘倒卧路边时灰尘和身体腐烂的气味；更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无家可归的孤独、惨遭杀戮的恐惧、任人凌辱的羞耻，“见不行‘鞠躬礼’的老人就杀”（难童向桂新，见第二章），连“小孩路过哨卡想绕过不行礼就被抓住狠狠打耳光”，“8岁表妹，隔塘的70多岁老妇婕四妈也给奸了……鬼子奸后，还捅下阴一剑”（难童关铨和，见第2章）。他们最小的年仅3岁，最大不过10来岁，便被迫目睹太多的死亡、暴行和罪恶，经历逃难、离散、饥饿和病痛……

战乱中仅留下少量有关难童的照片和纪录片，但只需看看孩子们骨瘦如柴的身躯和他们失神的眼睛，你便可以看到地狱。

是爱拯救了沉沦。1939年，吴菊芳女士在广东省领导了一个救援活动，组建儿童教养院、保育院和妇女生产工作团，收容殉国军人的遗属和沦陷区流离失所、无人照顾的难童。吴菊芳与这段历史的结缘是感性的：“当我踯躅行于韶关的大街小巷，看见那些面有菜色的妇女，尤其是那些因战火痛失家园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卧于街边，身躯瘦弱睁着一双流露企盼的大眼望着我时，我不禁怅然泪下，心中一阵阵涌起难以抑制的伤感。同是天涯沦落人，都是自幼痛失母爱。我一岁痛失母亲，更深切地体会到母爱对孩子的重要。如今我已身为人母，我的母爱要给子女，我的母爱更应给千百万饱受战争摧残的无辜难童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吴菊芳，见第二章）她和抢救队员“冒着炮火，把孩子从父母的尸体旁边领回来”；又忙着为孩子们洗澡喂食，忙得“汗水顺着前额往下流淌”，经常挺着大肚子为难童到处奔波的吴菊芳因此被叫做“院长妈妈”（她曾因怀孕时就读中山大学被人戏称“中大附中”）。让人难忘的不仅是这类寻常或不寻常的事，还有具体到肤觉的细微感受。一个难童回忆了和“院长妈妈”的一次接触：“（院长妈妈）慈爱地把我抱起来，我像她的小女儿一样把手搭到她的脖子里，那样感受着她的爱抚，是多么的甜蜜和温馨！这种感觉一直深藏在我这个孤女的心上。”（难童江流芳，见第三章）在生命都显得太微不足道的年代，有人记住了一次抚摸！这样的个人感受也许永远不会记入公共史册，它却使我无来由地感动。那个年代太多欺辱，太多悲惨，太多残酷，独独缺少爱抚。“院长妈妈”让失去母爱的孤女得到了人最需要的、值得一辈子珍藏的记忆，十分感性的记忆。它在个人生命史中不是微不足道的，在一个群体的集体记忆中不是微不足道的，在人性的“大历史”中

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这位“妈妈”即使在外有强敌，内有冷眼，心力交瘁的时候，依然竭其所能，“救得一个算一个，尽人力以补救天时”，虽然“也知道多收一个就多一份负担，就多一层压力，就多一种困难，但国难当头，何能考虑个人得失，尽一份力，尽一份心，可慰自己的良心”。（吴菊芳，见第三章）为了这些远远超出预计的难童，“院长妈妈”到处奔走筹款募捐，马不停蹄。而她自己不足6岁的爱儿，病了整整89天，却“未好好地陪他看病，未好好照料他”，等她风尘仆仆赶回家，爱儿已经病逝。“惊闻之下，如堕冰窟，四肢麻木，心口痛裂。回到家，惟抱起尸体痛哭……”（吴菊芳，见第二章）难童们都明白，“院长妈妈”是为了他们，献出了自己的儿子。他们自发送来山花和信，信里说：“院长妈妈，您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们成千上万的学童都是您的孩子。您不孤单，您不要悲哀！”（吴菊芳，见第二章）直到半个多世纪后（1992年），那些白头发、坐轮椅、拄手杖的老人见到远渡重洋来看望他们的吴菊芳院长，还依然热泪盈眶地大声喊她“妈妈”，而她，“站在出口的门旁边，拥抱了到会的近1000多个她的孩子。”这是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这一年，“院长妈妈”80岁。

难童与“院长妈妈”的历史，如果只链接1938年和1992年的某个瞬间，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往往是这样表述的。

但生活并不凝固在某个你愿意选定的瞬间。

1945年，八年艰苦抗战终于结束，共同抗敌的不同阶级并没有产生人民期待的联合政府。内战又打了4年，这个时候阶级利益高于一切。难童的苦难还得延伸。熬过九死一生的难童还没有完全从抗日战争中长大成人，就被抛入内战的漩涡。他们或是主动投军，或是被人拉了“猪仔兵”，在两个对立的营垒中互相射击。“日本仔”把他们变成孤儿，而内战却让他们不得不消灭同胞，使他们的孩子变成孤儿。“中间路线是没有的”，要不就只有失业、饥饿、被杀或被时代遗弃。难童或自谋生路，或变成战士，儿童教养院无事可为，“院长妈妈”便和丈夫（这个抗战胜利即被解职的“抗日将军”）一道，远离政治漩涡，以病避居海外。

1949年，阶级较量也有了结果，然而，战争并不因为内战的停止而终结。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没有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脱裤子、割尾巴”、“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晃就近30年，也是那一代难童最珍贵的青壮年时代。没有被敌人或同胞消灭的难童，继续面临着

被同志消灭或消灭同志才能生存的处境。一次接一次的“运动”给人的教育是什么呢？“从那以后，我猛然觉醒，从赞成变为反对！从反对变成报复！报复的心理支撑着自己思想和行动。于是……”（难童向桂新，见第七章）诚实的人学会撒谎，温和的人变成斗士，善良的人冷漠无情。为了使自己不致沦入每次“运动”都必须被揪出的那百分之五至十“规定指标”的“坏人”行列之中，人性极度扭曲，整个国家像疯了一样，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中间路线是没有人敢走的”（难童向桂新，见第七章）。不革别人的命，自己的命就会被革。

苦难在延伸，在更深之处延伸。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20世纪是个冷酷的时代。

那是一个可以将人对人的信任，对生活的信心彻底摧毁的时代。抗战、内乱、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出卖同胞、诬陷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杀人、被杀或整人、被整，一天连着一天。

日本人杀中国人，说是因为民族斗争；中国人杀中国人，说是因为阶级斗争；同一个阶级的人自相残杀，说是因为路线斗争；同一条线上的人彼此迫害，说是因为思想斗争或意识形态的斗争。大屠杀、种族灭绝、阶级报复、划线站队、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是那个世纪不同时期的关键词。

是的，为了利益、权力甚至观念之类不可或缺无法一统的东西，人类历史上不能没有“斗争”。斗争常常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人类历史也不能没有“和合”：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和平与合作，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的和解与合作，党派与党派、群体与群体的和谐与合作。“和”是太平盛世的平衡器，现在也正在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有许多东西我们过去无法摆脱，现在和将来也难以摆脱，如利益，如生存，特别是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们不能一厢情愿讲“和”，讲愚善。但有一种力量总让我们热泪盈眶，这就是爱。爱如水一样柔弱，也如水一样强大。它贯通天地，渗透万物，让世界充满生机和力量，而缺少它的地方必然是荒漠。它可以抚平创伤，就像被“院长妈妈”抚慰的孤女一样；也可以抚平沟壑，就像那些真正的伟人一样。中间道路其实是有的。政治家们（而不是只会谋取集团利益和权力的政客），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和平，通过一种更博大的爱，举重若轻，化解矛盾，去尝试抚平人类的冲突和仇杀呢？哪怕像“院长妈妈”一样，管你爱听不爱听，也要不断地对

重权在握的人唠叨一句："不能再整人了！"（吴菊芳，见第八章）

"和"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世界和平的理想。"和"，无须"同"，无须同于一个恃强凌弱的"共荣圈"，无须同于一条强加于人的思想戒律，无须同于一种独一无二的霸权声音。这就是真实的和谐社会，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多元世界。

难童叙述的一切似乎都属于历史了，但似乎它们又不完全成为历史。通过叙述和倾听，叙述者和倾听者各自经历了、分享了历史，叙述者和倾听者更重构了历史事实后面的社会真实。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也许，我们工作的意义在于，倾听和记录那些没有被倾听和记录的普通人的故事。而复现或重构普通人的历史，需要有更多人文的关怀、人性的关怀。对于那些或许并不惊心动魄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注，通过以一生为代价的生命经历来反思历史拷问人性，发现平凡故事之后的意义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因为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最普遍的社会真实和生活真实。

恰如"院长妈妈"所说："往事已矣，大家只有朝前看，往前走，浩劫之中谁能幸免，劫乱之后，谁能奋起。"（吴菊芳，见第八章）

2009年1月于中山大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三

共享的事件与分享的记忆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　邓圆也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儿童教养院（以下简称“儿教院”）收养了3万多名难童。70年过去了，这些难童如今大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自1988年起，儿童教养院校友们在中断了联系几十年以后重聚，之后年年都要举行各种聚会。虽然聚会者一年年在减少，但20年来，老人们对儿教院生活一直保持着令人难忘的热情共鸣和集体记忆。

作为“80后”年轻人，我有幸参加了他们的聚会，留下深刻印象。随着与他们的不断接触，我越来越渴望知道，在极端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这群难童的特殊身份给他们的过去和现状带来何种影响，他们如何背负此身份生存？儿教院的概况和办院方针、方法及风格对战后遗留儿童的未来有什么作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怎样被建立的？个人的身份在儿教院这个集体中或集体之外是如何被认同和认识的？儿教院的集体活动是如何渗透在每一个个体中，形成这一群体的集体记忆有何过程？他们如何去选择某些记忆并有意识地使之牢固传承下去？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群体，集体记忆是怎样在个体中被承担和分享的？

抗日战争后遗留儿童的历史与现状问题，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多是建立在口述史基础上的。当代口述历史学者通常藉由当事人的亲身经历记忆，来补充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在80年代以后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纷纷关注这一领域。但口述史发展的短短20年间，历史学总是尝试以一种客观的、理性的、尽量全面的思考性来关注这个问题，他们一直更多地关注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各种表述：包括语言、文字和影像的积累；对于人群的关注也更多地停留在主流阶级层面，或者从一些传统的价值判断下的“直接受害者”或者“直接参与者”等方面入手。

不管是哪一种研究趋向，口述史都具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和可切磋的地方。当代人“口述历史”的价值，不只是告诉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它们也透露“当代”社会人群的认同体系与权力关系。如果仅仅把口述史作为一种文献的补充或者某种既定观点的证明工具，都不是一种我想使用的方法。

而社会学方面，则更注重于宏观的战争对整体社会的破坏与重构问题，从整个社会体系入手，物质、精神层面的研究都比较宏大冷静，充满理性认识。而社会学在战争与记忆方面的研究开始比较早也比较成体系，“社会记忆”、“集体记忆”等理念都是由社会学率先提出。

抗日战争后遗留儿童这个问题本身并未引起真正的关注，如果以“被害者”的标准来要求，那么他们似乎属于“轻伤”；如果以“孤儿”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又好像属于“边缘”。对既定的社会分类来说，他们多少有点尴尬，但是为什么不认识到他们的独特性和相对性呢？从我自己认识到的问题来看，他们这个群体与众多群体一样，同样存在着关于认同、记忆等人类学命题，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之间的关系也是历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概念。

剑桥大学的教授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本书中，提出一个我认为十分重要和有效的理论：他把记忆从历史的角度转到了行为的角度——认为记忆是可进行“仪式性操练”的，事件的内在规则和象征性变得重要了。而这些操练带有一定的仪式性。

康纳顿对集体记忆的“仪式性操练”这个观点，对我影响比较大。因为广东省儿童教养院这个群体存在了太多太多这样的“仪式性操练”……耳濡目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规劝、教养，从本身的办院方针到院规，院内、分院之间的活动，以及周围环境和社会大背景带来的影响，都赋予他们一种“集体”的生活。而且，是一种甘愿的集体，不愿意被脱离，不愿意成为个人的集体成员的生活。大到军事演练、政治仪式，小到一起劳作、一起唱歌，每一个行为和事件，都蕴含了饱满的集体记忆。难得的是，这种集体生活并不是短暂的，不同于我们的九年义务教育那样，毕业以后作鸟兽散。他们是一辈子的集体，一辈子的兄弟姐妹，拥有一辈子的集体活动和集体记忆。

1988年，广东省儿童教养院校友会成立，校友会定期会举办聚会、团

拜会等集体活动。每个季度都有一个大型的聚会，还有平时假日里人数不同的聚餐等。他们的聚会总是充满了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讨论。在聚会外，他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领域里；在聚会中，他们才可以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现状，进行沟通和交流。通过聚会，可以看到一群共同特殊和共同患难的人之间特殊的感情和交流，很多现状也是在聚会中一一得知。儿教院因为分院众多，几十年颠沛流离，流失了很多学员的音讯。一切动乱结束后，以前彼此对立的人又重新开始有了共识和联络，尽管此时相互之间的社会身份已经大相径庭。

在儿教院研究中，我越来越真实地感受到历史在一群人身上的烙印和创伤，感受到身份的矛盾怎样在一个活生生的人身上徘徊，感受到现实对人的影响，来自于环境、机遇的和来自身份和个人能力的交迭。然而在这个群体中更为特殊的是，他们的身份已经在战争的剥离下以独特的“集体中的个人”取代了“家庭中的自然人”，因此这个身份既是内化的，又是外化的。而且这个身份是共享的，被一群人用时间锤炼，用事件篆刻，深深地扎根在身份拥有者的记忆中。

在更早些时候，他们就创办了一本《广东儿童教养院校友会通讯》，至今仍在出刊。正式出版过的关于儿教院的书籍有已故院长吴菊芳女士的《广东省儿童教养院院史稿》，李浈博士的《花开梦怀》、《讲述历史——抗日难童的真实人生》和儿教院院史编撰委员会编写的《风火岁月的丰碑——广东儿童教养院院史回忆录》，以及儿教院同学自撰或自费印行的各种小册子。这些出版物都旨在重塑和回忆儿教院的历史，承担着一种文字上的仪式作用。

儿教院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实际从1939年就开始了，到今天已经将近70年。儿教院的多年“家、校、场、营”教育和后来的聚会、期刊和书籍出版的统筹，都是在反复地“操练”着这个群体共同的记忆，包括群体设定的记忆和被同化、分享、分工合作的记忆。记忆的“仪式性操练”已经使儿教院的集体记忆在他们的生活中生根。尽管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但都有着对自己“儿教院学员”身份的强烈归宿感和认同感，这与普通的孤儿院完全不同。对于这个群体来说，记忆，是对自身历史与现状的延续和实证。

我对儿教院校友会聚会的基本研究线索分为事件和记忆两方面，并不是单独陈述事件或者呈现记忆，而是试图通过事件来阐述记忆的形成与被

分享的过程。事件本身具有延续性，这是历史赋予它的，而记忆则贯彻和加强了这种连续性，同时有自己的影响和生存方式。

通过多次接触和访谈，我和儿教院的老人们建立了难能可贵的感情。每次去广州第二少年宫的餐厅聚餐时，看着上楼梯位置的红色的订位板上写着“广东省儿教院校友会”，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向上爬，爬上二楼，就看到几十位老人家围坐在一起，兴高采烈地攀谈着。李汉魂将军和吴菊芳院长的女儿李浈博士也经常来参加聚会，她从美国远道而来，每个季度的聚会她基本都会参加。吴菊芳女士去世以后，校友会的事主要就是李浈参与。老人们对吴菊芳院长妈妈的感情也倾注在了校友会和李浈博士身上，每次她出现，老人们总是有点激动地夹道欢迎，争相握住她的手。李浈虽然不是直接参与儿教院从创办到结束的种种事件，但是后来她根据自己的一部分经历、母亲的回忆录和儿教院院史史稿编著了纪念儿教院的两本书。

每次聚会结束，老人们都会一起高唱一些儿童教养院时代的歌曲。那些有明显儿歌特色的歌曲，从老人们的嘴里唱出来，甚至喊出来时，我会没来由地特别感动，特别震动。这种已经附生在体内的情感，不是用简单的爱国主义可以说明的。老人们除了聚会以外，最大的兴趣也是写书。校友会一些主干人员正在修改和补充着儿教院的文献资料，包括院史和个人史。他们有很强烈的意愿想要将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那种深厚的记忆在每个人的思想、行动中都一直生机勃勃地存在着。他们渴望再现历史——通过记忆和选择，以及情感与事实的相融来再现历史记忆。儿教院现在的集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遵循着“传统”来行为，遵循着记忆来寻求历史的重新阅读。

回顾儿教院的生活以及重新唤起对儿教院教育风格的认同，通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来进行集体回忆。在1939年至1949年间儿教院的难童们所经历的集体生活给他们的记忆建构打下了基础，记忆的外表被包裹着层次丰富的“仪式性”活动（集体参与的戏剧、独立创作的音乐、集体劳动、军事演习等）、属于儿教院自己的教育体系（自己的课本及学制、力行中学和各师范、农工科院的建立）、集体主义观念的灌输以及军事化的管理等；记忆的内部则是群体中彼此的身份认同感，在同一个极端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拟亲风格的相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儿教院的一种制度），相似的经历、相似的身份边界使这个群体内部在十年的相处过程中差异感

较少，每个人都习惯并且依赖着集体生活。儿教院的管理风格对这种集体记忆的形成有关键性和持续的作用："家、校、场、营"的办院方针，井然有序地在战乱时代牵引着大批难童的生活；院长吴菊芳对儿童心理和爱的需求的了解，使儿教院的工作人员担负起比养护人员更多更复杂的工作，在保证难童生存的前提下，对他们的身心成长都负起责任。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历史和传统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构建起来，儿教院在十年间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活生生的历史，发生和生长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历史，每个人都在体内保存着对这段历史的体验和记忆，而且在这段体验中所形成的规则、制约、伦理和习惯不会被时间影响它的韧性。在数年后的某个契机，这些保存着历史的人又将重新将记忆聚合，通过纪念、回顾等方式，通过一系列礼仪和象征来暗示自身与过去的连续性。

这种不被时间磨灭的连续记忆并非"想象的共同体"，儿教院这个群体之所以能有一体感和连带感，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象彼此拥有共同的过去记忆，而是他们确实拥有过，并且自愿强调出来这些共同的过去记忆，并在历史过去之后持续进行着共同的回忆活动以保证集体记忆的继续分享和存在。把"记忆的共同体"置于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来思考的话，就能更切身地体会到集体记忆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背景下如何被抑制，又如何被恢复和唤醒，甚至被创造的过程。因此，儿教院在1949年结束后的集体记忆并不是断层，也没有消失，而是被抑制地保存在集体成员心中，当外界时机允许时，抑制的记忆就会自愿地恢复。

这种"恢复"，在象征的层面上，总是能够有效地加强大家有共同来源的历史记忆，象征渗透在同情感和仪式性的行为当中。在中国，"家庭"、"亲缘"、"兄弟姐妹"和"共同的苦难"总是能够最牢固最快速地区分和凝聚一个群体。通过"母爱"和"兄弟姐妹"情感缘系的建立，儿教院在建立或强化成员们同出于一母体的同胞手足之情的历史记忆。吴菊芳院长从办院开始，就将"兄弟姐妹"和家庭的感觉注入儿教院的难童们心中，并且通过多种方法来巩固和加深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仪式活动中的关系。在儿教院的集体活动中，这种风格从观念的渗透到活动的伸展都贯彻始终。他们的办院理念通过具体的活动赋予到每个参与者身上，一些既定的艺术政治活动，以及平日里的劳作，都使这些理念深深地扎根在每个参与者心目中，再加以团结友爱和兄弟姐妹感情的引导，使他们的集体认同和集体意识愈加强烈。他们通过儿教院自己创作的歌曲剧目和创办自己

的杂志，以及仪式性的聚会等途径，将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经历集合、加强，变成这一个群体共有的记忆和共有的风格，以此来巩固“兄弟姐妹”的拟亲关系。直到现在，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谈到吴菊芳院长的时候，仍然一致敬称“院长妈妈”。

群体的记忆是如此有趣，它绝对不是个人史的堆砌，而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共同认知和集体认同上交叉部分的东西。共同的经历与身份边界，共同的集体活动、记忆活动和回忆活动都是形成群体记忆并且保存它、延续它的重要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在1949年后失散的群体在重新集合后，仍然可以形成超越个人史的集体历史回忆的再现。集体记忆在分散后重新聚合，再重新被分享，这个过程可以脱离时间性而注重于内在规则和象征性。就像拼图一样，完整拼好的拼图才可以被认出是什么图案构造，而分散的拼图各自保存着自己的属性——每一块都是只属于这整幅拼图的，无法属于其他的整幅拼图；就算这个拼图漂流到大西洋北岸，在离开整幅拼图后拥有了不一样的经历，但是一旦它被重新置于整幅拼图中，它仍然可以与之契合，它的属性仍旧没有改变。集体记忆不只是拼图的分分合合这么简单，它有血有肉、饱满、健谈，有时顽固，有时却容易被说服改变。人是记忆的载体，所以我不得不通过人群来研究记忆，假设记忆是个善于藏匿、层次丰富又羞涩的东西。

2008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